

大時代叢書

變化的人的崗位

王健著



王健著

文化人的崗位

廣州漢民北路

新民圖書雜誌公司經售

文化人的崗位 目錄

- 一 侵略性的戰爭是毀滅人類文化的……………一
- 二 文化動員是全面抗戰的重要任務……………五
- 三 文化動員的對象……………九
- 四 文化動員的工具……………三四
- 五 教育了別人也教育了自己……………四三

文化人的崗位

侵略性的戰爭是毀滅人類文化的

我們能說帝國主義者對於弱小民族或殖民地發動侵略性的戰爭是「師出無名」嗎？

意大利要征服阿比西尼亞，明明是爲了挽救國內如湧似潮的經濟恐慌，安定法西斯蒂政權的動搖；但他口口聲聲嚷着「宣揚文明」，「拯阿人於水深火熱之中」，結果是以近代化的機械武器，向僅有原始作戰工具的阿比西尼亞大眾殘酷屠戮。

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行爲也如出一轍，「九一八」瀋陽事變發生，它以「東亞的安定勢力」自居，這次蘆溝橋事變及「八一三」在上海的挑釁，更以「防止中國赤化，務必加以懲膺」而自豪。事實上，日本向世界各國誇稱「滿州國」爲「王道樂土」，

現在成了最不安甯的「人間地獄」了；在已佔領的華北各省區域中，也因為「皇軍」的光降，將要遍地哀聲了。

法西斯蒂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戰爭，是以「宣揚文化」為名，而以「毀滅文化」為實的。就以這次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各地的暴行為例，已經算是充分地證明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槍炮和飛機除了作戰目的以外，好像是專對着文化機關施毒的。將近千數的大、中、小學校，若干有歷史價值及收藏豐富的研究院，圖書館，博物館，及傳播文化與給中國人民以精神糧食的報館、通訊社、書局、及廣播電台，都成了砲火下的灰燼了。這種重大的損失，遠勝於有形的金錢。像這次給日軍縱火焚毀的天津南開大學，不但是張伯苓先生畢生致力的事業，更是千萬文化份子及青年學生精神的所寄；最可痛心的是若干重要的圖書館及博物館，也未能倖免，無數珍藏的書籍，版畫儀器……都有考古的根據，是我們的祖宗傳下來的最寶貴，最稀世的文化遺產，現在却永絕於世，萬劫不回了。

日本帝國主義者爲了要使中國人民大眾都變成帝國的順民和卑從的奴隸，不惜

出之以最殘暴的反人道行爲，到處殺害熱血有爲的青年，及威武不屈的知識份子。在它，是爲了根絕顛覆他們本身的禍患，在我們，却是無可補償的損失，因爲那班被迫害的如生龍活虎的青年及知識份子，都是民族的靈魂，國家的棟樑，失掉了他們的生命的活動，就好像人身中流盡了寶貴的血液，將週身麻木不仁，瀕於死境。

從歷史的觀點而論，今日世界的廣大人民，都渴求着一個對內民主對外和平（嚴格地說，人類應當有一個共同的目標，不該有何民族國家的界限）的光明前途，他們反對破壞性的侵略戰爭，要求大家有一副自由的身手，參加生產，合理享受，創造人類文化的豐饒的果實。而日本帝國主義者正是背道而馳，代表少數人利益的黷武軍人，無恥政客和貪婪的財閥，企圖造成對內的法西斯蒂獨裁政權，對外攫取殖民地及弱小民族，這簡直是夢想倒轉歷史車輪的荒誕行爲，想把人類從較高階段的文化境界遂入黑暗野蠻的人間地獄。

3

郭沫若先生說過：我們這次發動對日抗戰，是理性與獸性之戰，這實在是一個言簡

意賅的解釋。敵人的侵略行爲是毀滅文化，而我們呢，爲了民族生命的延續，歷史的演進，人類的將來，都該義不容辭地擎起「保衛文化」的大纛，建立「敵人不投降，就消滅它」的堅強的信念。

我們若不甘願做民族的罪人和歷史的罪人，就該把敵人痛擊到體無完膚，猶像一分，甚或寬容一分，就無異延長人類的痛苦，我們是應該嚴峻地執行這個偉大的神聖任務。

文化動員是全面抗戰中的重要任務

我們誓死抗戰重要的目的之一，既然是「保衛文化，」要求民族的澈底解放，和拯救全人類達到光明的彼岸，就不容漠視這是一個艱苦險阻的生死鬪爭；所以這一次全國上下都以「全面抗戰」相號召，相督勵了。

「全面抗戰，」應該集中全國的一切人力，物力，財力，和智力，與敵周旋，以獲取最後光榮的勝利。進一步的說，就是除了軍事的動員以外，同時還要作政治，經濟，外交，教育和文化的動員。如健全政府組織，提高行政效率，開放民衆運動，釋放政治犯等是屬於政治動員方面的；如統制金融，交通機關，糧食，內外貿易，工業生產等，是屬於經濟動員方面的；如確立外交政策，（以提倡集體安全制度，及解放弱小民族爲中心目標）遣派國民外交使節，聯絡同情友邦的關係，是屬於外交動員方面的；如釐訂戰時教育方針及目標，改

變及充實教材內容，加緊學生的軍事，政治訓練，是屬於教育動員方面的。

爲什麼文化動員，也是全面抗戰中的一個重要任務呢，打個簡單明白的譬喻，全面抗戰中的軍事動員，政治動員，經濟動員，外交動員，和教育動員，好比一個人體上的手足和各種感官（如眼、耳、鼻、口、和腦經）它們都能發揮各自的機能和作用，完成一個共同的目標；但是唯一不能缺少的就是血液，它能夠使手足活動，各種感官靈便，並互相間發生有機的聯絡，那個人體中的血液，就是全面抗戰中的「文化動員」。

我們這次對日抗戰，不僅是一個表面上的英勇的行動，而且有它的理論認識的根據。那是有待於文化人用各種方法去盡力揭發，號召，建議，和推動。

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的侵略行動是出自它的傳統的大陸政策，文化人應該從縱的歷史事實去追述我們的朝鮮，琉球，台灣是怎麼地給敵人搶奪去了的，以及這三個地方的人民大眾沉淪於怎樣的暗無天日之中；同時，在橫的方面，日帝國主義者如何處心積慮的，擴充軍隊，強調國內民衆的愛國情緒，鼓勵提倡「武士道」的殺戮精神，轉

種侵略中國的準備工作（如勾結封建軍閥破壞統一，以經濟提攜爲名，攫取權益爲實等事實）以及在國際間進行有計劃的欺騙和反宣傳，文化人應該給以無情的揭發，使我們全國上下能人人自危而奮起。

十年來的國民黨執政期間，各帝國主義者有的助長封建軍閥的惡勢力，對中央政權發生一個離心運動，唯恐統一後的中國對它們有何不利；有的帝國主義者更慫恿我們的政府作不必要的安內工作，大大地減削了我們民族的寶貴力量，替敵人們做了一名「清道夫」；在這個時候，文化人就應該廣事號召一個包容各黨各派的聯合統一戰線。集中全國的力量準備與當前的最大敵人周旋，並建議於政府當局，在這個號召的過程之中，也許（不必然的）有若干文化人見忌於執政者而遭非命，但歷史的法則將保證這些鮮血沒有白流。去年西安事變後全國包容各黨各派的聯合統一戰線，在經過若干人及相當時期的熱烈號召和建議，終于由醞釀中漸次實現了。

許多運動在戰事爆發後，是亟需文化人用文字宣傳或行動參加去推動的。好比民

衆運動的開放，在這次對日軍事行動中是顯得刻不容緩了，這是軍事動員與政治動員之間的脫節，我們的文化人洞燭了這個缺陷，就在各種報章雜誌中大聲疾呼，提起注意及實行，並且有若干社會地位較高的文化人，在身負軍事重責的當局面前，力斥過去對民衆運動包而不辦的排外政策的錯誤。

許多淺見唯利的民族資本家，到如今還不瞭解長期的全面抗戰的意義，夢想軍事告一相當結束以後，仍圖營業，以致對於內移的問題趑趄不前。文化人應該一方面推動政府對於民族工業的遷移內地問題，由表示抗戰決心和維持戰時及國計民生出發，作一個通盤的計劃，同時再向工商界加以勸誘和說明。根據最近的報告，上海的工廠已有向內地遷移了，大半也在準備期中，這不能不歸功於文化人的推動；還有戰時的學校，也應該有同樣的隨着軍事移動的必要。

總之，隨着文化動員、軍事、政治、經濟、外交、教育，也都動員起來，而且彼此間作有機的配合和運用，這是由于文化動員的普遍和深入，而成爲全面抗戰的一個重要的領域了。

文化動員的對象

文化動員當然是以文化人爲中心份子的，在沒有論到它的對象以前，我們應該對於文化人的界說，及其階級性先有一個認識。

通常我們一提到「文化人」三個字，就會連想到文化人應該是執筆爲文的作家或新聞記者，或是度着舌耕生涯的執鞭教師，而不脫離文化事業的範疇的；然而，在抗戰期中，我們應該把文化人的界說廣義化起來，爲了要獲得更多數人的動員，我們覺得文化人以文化事業作爲職業看的，並不占怎樣大的成分，他們是分散在各種職業羣裏面的，一個園藝家可以被稱爲一個文化人，一個工程師也可以被稱爲一個文化人，其他如銀行，工廠，政治機關裏等，都有文化人的存在，我們覺得把文化人解釋爲進步的知識份子比較適當些。

其次，我們再論到文化人的階級性，在過去中國歷史上的士大夫階級，這等人的身份，他們的經濟基礎至少是堪以溫飽的，當然出自達官顯貴之門的是大有人在，所謂「學優則仕。」中國的教育從過去的科舉制度，一直演進到目下的歐美化階段，能夠獲得讀書機會的，中上層資產階級的子女是佔據絕對的多數，那是無庸置疑的。

然而，時代畢竟是進化的，「得天獨厚」的公子哥兒和名門小姐也隨着他們或她們本身階級的動搖和沒落而感受到空前未有的恐慌了。起初他們還勉力撐持，不改舊態，然而，恐慌的程度日愈深重，上層的沒落為中層，中層的沒落為下層，（當然下層同時也降為赤貧，）他們是感到形勢日非了。同時，這班知識青年男女，因為大都還沒有深染上養尊處優的惡習，加以情感的亢奮，和特有的敏感，使他們漸漸地同情於被壓迫階層的痛苦，意志堅強認識清楚的，甚或跟隨了他們的政治信仰，揚棄了本身的階級基礎，投向勞苦大眾的中間去。

因為文化人隨着他們職業的分野散佈得這樣廣大，因為時代的變遷，使他們具有

一種獨特的承上接下的階級性，所以全面抗戰中文化動員實在如人類身體裏的血液，使四肢活動，感官運用，它的功能是普遍的。

至於文化動員的對象，也就是文化人的崗位所在；我們覺得文化人的工作崗位是無所不在的；若是借用軍事上的術語，那該是文化遊擊運動的擴大與展開。文化人應該採取散兵線的攻勢，如水銀瀉地似的，深入各階層，各職業羣里去，播散革命理論及作戰技術的種子，透過一個民族解放的程序，使全人類都獲得人的生活，他們有自由的天地，有合理的享受，他們愛正義，他們持公理，他們各自參加社會的生產部門，使人類不斷地達到較高的文化境界。

至于文化動員的對象，我們可作如下的分野：

(一)軍隊 記得北伐以前，人民每提起兵士兩字，必詈之以「丘八」，馬上就展現一副慘酷，粗暴的面影。長官把他們當作求得富貴榮華的工具，於是，每次戰爭里僥倖免於一死，無論勝敗，就把他們非本能的慘酷和粗暴向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洩恨了。

然而，士兵畢竟是保衛國家的干城和前驅，蘇聯的紅軍個個都是健康的，堅實的，有教養的；他們所以異於我們軍閥專制時代的丘八的，是前者不但已經獲得人的地位，而且都受過相當程度的政治教育；而我們的丘八爺只不過是擁兵自重的軍閥們可憐的工具，永遠地執着自己的生命，作無休止的冒險，當然在身心兩方面與蘇聯的紅軍相較是判若雲泥了。

在這次四個多月的對日抗戰中，很顯明的，受過充分政治教育的軍隊，都是有紀律的，戰鬥力堅強的，最爲奇蹟的，他們能夠吸引廣大的民衆到作戰的陣營里來。反之，帶有封建色彩的軍隊大多軍紀掃蕩，望敵而逃，最多也只能做到聽候驅使，徒然犧牲。

潘漢年先生在抵抗三日刊第十六期撰文大聲疾呼，應該提高軍隊的政治質量與素養的堅強，使他們除高級的作戰技術以外，更能夠瞭解自身的責任及民族解放戰爭的重要，有了這種自覺的基礎，就不必擔憂，他們會向敵人投降，向民衆騷擾，他們必能不屈不撓地發揮優越的戰術，不惜血肉的犧牲，完成他們本身的任務的。

軍隊政治教育的擔負者非文化人莫屬，文化人可以用文字或口頭宣傳，演講、歌詠、美術、和演劇的各種方式提高他們的文化水準，和政治意識，給他們在精神上打下這個鞏固的基礎，並使它能夠與他們的作戰能力，適當地配合和運用，以鍛鍊成爲一支任何威脅不能摧枯的鐵軍。

軍事動員是全面抗戰中首當其衝的一環，過去的教訓和目前的事實，都足以證明軍隊政治教育的絕對重要性，負有專責的文化人，應該緊緊把握着這個最好致力的機會。

(二)農民 文化動員的第二個重要對象該是農民羣衆了，尤其在這個戰爭時期，都市裏大批的失業工人，店員，及小市民，因爲生活的無法維持，戰禍的迫於眉睫，大多紛紛還鄉了。所以本來已經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羣衆，現在跟着戰爭的發生，在質與量兩方面，都起了不少的變化。

我們這次對日抗戰是以「全民抗戰」四個大字相號召的，所謂四萬萬五千萬人

的一個鐵的集體；然而說來慚愧，除了軍事動員以外，其餘的都是部份的動員，尤以民衆的動員（以農工羣衆爲主體）在這四個多月事實的暴露之下，一致公認爲最弱的一環，他們不但不能夠跟軍事動員配合起來，反而成了後者的阻力。根據幾個軍事長官的談話，我們才知道軍隊到的地方，有時民衆都逃光了，沒有人幫助他們分擔運輸，交通，救護，飲食和嚮導等工作。有時民衆並未全逃，留着的都是漢奸小醜，他們僅得敵人少許的小惠，竟會在敵人的驅使和監督下，破壞我們的交通線，洩漏我們的軍事祕密，替敵人做登岸，包抄，側擊的嚮導，使我們可能一鼓而下的形勢，也因爲顧忌漢奸的作祟，左右擔憂。有時竟完全敗壞在漢奸的手里，弄成一敗塗地的頹勢。

農民化身的漢奸小醜多如毛，殺是殺不盡頭的。我們一方面可憐他們的愚昧無知，受人欺瞞；一方面也應該窮本追源，他們過去是怎樣的在軍閥和封建餘孽之下展轉哀吟，不死不活。高喊了十年的農民運動，徒具了一個形式，一個口號，他們沒有受過政治教育，組織訓練，一旦有利可圖，他們那裏知道，這是與國家民族利益相違背的行爲呢。所以，

有識之士，已經認清肅清漢奸不僅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了。這個關係國族存亡的大問題，拿來在全面抗戰的今天解決，實在是過去主持民衆運動的負責人一個不可寬恕的罪惡。

文化動員應該普遍到農民羣衆中去，雖然這個艱巨的工作在今日，已經嫌其太晚，文化人應當急起直追，加緊工作的程序，務使這個巨大的力量，早日與軍事動員合流。

我們覺得文化動員在農村，應當先號召一個農民生活改善的普遍運動，根據最近深入內地農村服務的文化團體的工作報告，他們一致的報道是：「向農民們宣傳抗戰的意義及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殘暴行爲，只能使他們刺激一時，興奮一時，一轉眼他們會向你愁眉縐臉地訴苦，鄉下的土豪劣紳是怎樣殺人不見血的「坐地虎」，不但向他們暴徵橫斂，還要奸淫他們的妻女，蹂躪他們的子弟，官廳的老爺們也充耳不聞，只知向他們增稅加徵，稍有不遂使成了階下之囚。」

農民的生活改善運動是要依靠賢明的政府倡導的，一方面政府自動減輕田畝的

捐稅；一方面趁機根絕鄉村中的封建餘孽。雖然，在全面抗戰中，我們要盡力避免內部的磨擦，集中力量對外；但是一個澈底的革命行動，是不能「因噎廢食」——「左顧右忌」的。不僅此也，對於勞資糾紛，貪官污吏……等都應該加以根本的處理。

我們相信，農民們如果能夠解脫了生活上的逼迫，獲得一個自由的天地，再加以相當的教育與訓練，是不難把他們吸引到救亡的組織里來的。

中國農民因為過去文化水準的低落，向他們宣傳抗敵的理論，確實是對牛彈琴，格格不入；若再進一步地吸引他們到救亡的組織里來，更是天大的難事。

惲逸羣先生在「組織農民的主要問題」一文中，提到若干鄉村工作者，根據他們的實際經驗提供了「抗日與農民生活的聯繫」這一個問題的研究結果，大意如此：

「農民是靠着土地而生活的，一離開他的土地就無以為生……所以對農民最大的威脅，就是離開了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地。他們雖不明白什麼是日本帝國主義，但是告訴他們「鬼子來了，不能留在生長的土地上耕作」之後，他們對保衛國土的要求，一

定非常熱烈而堅決……他們會自然而然地熱烈援助國軍，嚴防漢奸……要求學習阻止敵軍進展的方法技術，在他們自發的要求下，就可以順利地組織起來。」

上面一段寶貴的實際意見，是值得文化動員在鄉村中的虛心接受並實行的。

至於怎樣組織農民呢，我們覺得第一步應該整理並充實原有的組織，如保甲制度，壯丁訓練……等，其次再根據當地的實際情形，施行一點教育工作，如中心民衆學校民衆教育館，及中心茶園等。

還有一點應該特別注意的，要動員農民必定要協助他們從事生產。文化人當中的農事技術人員，當本其科學教育的素養，幫同農民改良種子及農作，興辦水利，推廣造林，墾植荒地，提倡農村副業等。

因爲，從這一方面着力，可以建立起農民對於下鄉工作的文化人的信仰，由於這個良好的關係，再進行組織與訓練工作，就感到輕而易舉了。

最後應該特別提出的，有組織有訓練的農民羣衆是抗戰前線上勇驍有力的鬥士，

文化人可以集中農民中的壯丁，組織成遊擊的義勇隊，平時可以擔任村中治安，防止漢奸的工作，必要時可以協同正式軍隊作戰，以他們對於地勢的熟悉，土地的留戀，必然將成爲一支抗戰中的主力軍。

(三)工人 中國的工人羣衆是在非人的慘酷待遇之下過着生活的，他們的痛苦和遭遇，遠甚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之上。讓我們來檢閱他們的生活狀況罷：

天未黎明，就睜開惺忪的兩眼走向工廠作工，最開明的廠主也要叫他們一日做十小時以上的工，普通十二小時或十四小時也是常見的事。其中休息的時間可以說是絕少，甚至連吃飯的時候也要做工，所以工人大都滿身是病，做工好像在逐漸消滅他們的生命，能有工做，出賣掉賤價的勞力，在他們還算是幸福的事情。他們在工廠里可以說是沒有絲毫的保障，工作稍不經心，多病請假，開罪工頭，慢禮廠主……都會成爲被欺工的理由。有時遇到工潮的發生，工人爲了要求生活的改善，當然要與廠主發生正面的衝突，於是廠主向他們撒下了警戒網和陷阱，意志薄弱的成了黃色工人，出賣了全體工人的

利益，這是他們中的內奸；有時廠方甚至利用外界軍警的威力，加以逮捕，投之於獄。……

畢竟，工人是羣衆中的進步份子，他們愈是遭受廠方的壓迫和統治階級的殘害，愈是有組織，有力量，愈是勇敢的鬥士。

工人的生活及工作環境，使他們的意識比較清楚，尤其在帝國主義者設立的工廠里，他們不但受到一般資本家對於勞動者的壓榨，而且是來自外國的資本家，這更會激起他們強烈的「民族意識」了。

我們覺得在戰爭時期，是特別需要熟練的機械工人的，因為他們與軍事工業有關，縱然他們作工的廠家因戰禍而停頓，儘可吸收他們到國家統制的各工業部門里去。

對於工人的文化動員，應該是建立一套配合於他們的熟練的技術底政治及組織訓練。

工人羣衆中頗多犯幼稚病或個人英雄主義色彩的，這種傾向却大大有礙工人運

動的前途，也只有正確前進的政治及組織訓練，才能克服這個不良的傾向。

犯幼稚病的工人大半熱心有餘，成事不足；充滿了個人英雄主義色彩的工人，大半是功利主義者，只顧一己的鋒芒，絲毫不以團體的發展及實際工作爲念。

訓練工人只應該用一小半的力量在理論的闡發上，大半的努力還在使他們在實踐中增進對於理論的認識，加強鬥爭的力量。

「五卅」慘案中工人是空前的抬頭了，他們成功了那個大運動中最活躍的份子，十年前的清黨中，上海的工人運動，本來有很好的政治前途，却因爲政治上的重大轉變和本身技術的不夠而慘敗了。現在中國的政治已經成了一個統一的局面，工人運動除了這個內部的磨擦，一定是反帝運動的生力者。

（四）知識青年 知識青年大多是在學校里讀書的大中學生，通常我們都把他們當作被教育者看待，教員盡量的貫輸，他們也盡量的吸收。現在，是非常的戰爭時期了，我們要打破這個單純的教育者與被教育者的關係，使他們一方面吸收，一方面也要貫

輸給別人。文化動員在這一方面的努力可以收得幾何級數的效果的。一個受了嚴格訓練的學生，他能夠發揮他的力量到千百的羣衆身上去，這個影響是多麼的雄偉。

戰爭發生了，在戰區里面以及接近戰區的學校，都不能照常開課，所以一定有着干知識青年要失學。其實，戰時的社會實踐環境倒成了他們的一個新學校，使他們更能夠投身到廣大民衆中間去學習，去工作。

非戰區內的學校，雖然尚能勉強開課，但是教材的內容，訓練的方針……却應當適合戰時的需要和目的。

過去中國的教育制度不脫形式主義的窠臼，學生從小學起到大學止，一天到晚在學分，文憑，分數，和會考的重要壓迫下討生活。因為學生成了一部機器，一切精神的效率都失掉了，學生們被諷爲「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而不自覺，若把他們當作未來國家民族的中流砥柱，那是難免叫我們生杞人之憂了。

戰時教育應該有戰時的教育機構，在課程方面，我們覺得有系統的基本知識，仍舊

不能放棄（如中、英、算、史、地、理化、美術、等等），至少要佔全部課程的三分之一。不過要特別注意的，課程的內容務使其與抗戰發生關聯，如中文、英文，除了它本身的文字技巧以外，同時要慎重理論的根據。研究歷史不能像從前一篇流水帳似地背誦帝王朝代的年日和名字了，要多注意時代經濟背景的分析及其前途的推測了，研究理化，更應該使學生具備防空防毒的知識和實驗。

除此應該加重政治訓練，如當前救亡政策與策略，戰術，民族解放的理論，政治經濟常識等。

學生受了嚴格的政治訓練，軍事訓練才不致於「架空」，因為前者是目的，後者是手段，不瞭解目的地運用手段，等於盲人騎瞎馬，墮入歧途而不自覺。

至於那班因經濟困難或無校可入的失學青年，我們更不能把他們擯之於門外。他們大都在情緒上很亢奮，熱誠有餘的，就以此次「八一三」以來上海抗戰的事實而論，若干青年學生「救國無門」，起初頗懷疑，為什麼在全面抗戰的今天有力的不能出力呢。

於是毛遂自荐地向救亡團體的負責人接洽了，結果是未得要領，甚或拒而不納，有些投機的救亡團體騙取了他們的金錢，忽然悄然中止了，有些漢奸性的救亡團體，更把他們誘入了反對抗戰的一條錯路上去。可憐救國心切，缺乏審慎的青年學生，受了這種欺侮和陷害，他們是煩惱，失望，悲觀，有的甚至從此聲銷匿跡了。本來可能成爲抗戰工作中的生力，現在是無形消失了。

文化動員對於這班「救國無門」的都市知識青年，應該一方面盡力把他們吸引到救亡團體裏來，並適當地分配他們到難民收容所，傷兵醫院，前線陣地和里弄組織中去担任工作；一方面再加緊對於他們的訓練，使他們在理論認識上，澈底明瞭日本帝國主義者傳統的大陸政策，國內法西斯蒂政權的動搖，人民大眾生活水準的降落，以及我國從統一到抗戰的途徑，並一個民族的澈底解放將影響到帝國主義的存在，及弱小民族洶湧澎湃的要求自由獨立的運動，得以擴大和開展。同時在工作實踐上，使他們知道對日抗戰該是怎樣一個艱苦的奮鬥過程，在這個偉大的任務之下，大家應該只知集

不知個人，集中力量去完成那個任務。

最後我們應該提起的，時代是一個大洪爐，尤其是在非常的抗戰時期，敵人勒住我們的咽喉，威脅到生命的存在，知識青年應該澈底揚棄其本身階級的劣根性，把自己降為羣衆中的一員，因為組織是從下而上的，力量也是從下而上的。我們深信廣大的羣衆中，果有知識青年的獻身參加，那個組織更將健全，力量更將偉大。我們應該對於在時代大洪爐中經過千錘百鍊的知識青年，寄無窮的期望。

(五) 難民與傷兵 隨着戰事的發生，首先觸入眼簾的大問題，就是成千成萬的難民的收容問題，他們都是浩劫中的餘生，大多成了流離失所的流亡羣了。因為交通的阻隔，縱係有家可歸，也只得暫時在大都市的街頭躑躅，於是宿風露雨，飢寒煎迫，成了他們命運的必然。但是人是不能離開物質的供養而生活的，他們居住的場所給焚毀了，飲料的來源停止了，如果戰事的發生適在嚴寒的隆冬，縱然不給餓死，也大有凍斃的可虞。他們要掙扎圖存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他們挺而走險，在平時這是違背法律，破壞社會

秩序的行爲，在戰時，更是觸犯戒嚴的令律，他們以求生者轉以求死，窮根究底是被敵人間接地殺害了，他們在他們愚昧和情急的意識中，未嘗不預期到這種悲慘的結局，然而在他們是無助的，他們私念着萬一的僥倖。第二條路，就是這次在上海抗戰以來層見不窮的，他們大半甘心做爲虎作伥的漢奸了，比較膽大冒險的僥倖在戰區裏，破壞國軍的交通線，刺探國軍的作戰情形，這是最危險性的。其次是所謂漢奸小醜，專在都市里混跡，如在自來水管里，或公共衛生場所施放毒藥，在下層羣衆中散佈謠言，聳動人心。在這三個月來，我們不是看見有些漢奸小醜，當場揭露，給憤怒的羣衆拳打腳踢地活活毆死嗎？然而，那是少數中的少數，這班人真是如毛叢生的。

幸運的能被送到了難民收容所去，衣住有着，也就很少甘心下流了。然而，人間悲劇，還是層出迭見的，我們不能十分責備負責救濟的機關，因爲成千成萬的難民，本身沒有組織，知識是那樣的淺陋，收容後的管理頗成問題。最爲擔憂的是經濟問題。捐款一時不易籌措，戰事延長又屬遙遙無期，當然應該設法向內地遣散，但是交通的不便，沿途的危

險，有的時候簡直明明把千萬人送入死場，真是慘痛之至，所以到現在上海難民收容所里，還有二十萬人以上。

因為難民到了收容所里，不像以前在外時的流動分散，使我們發現了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如沈茲九先生曾在抵抗三日刊發表了「為羔羊們請命」一文，痛述難民羣中不少包工身急待援救，否則她們將終其生在暗無天日之中了。根據我們的調查和各方報告，除了包工身以外，還有若干身體仔弱發育不全的童工，過去也同樣在工頭的淫威下展轉悲吟。現在他們既然無工可做了，工頭們就把他們或她們轉賣別人，作最後一次的剝削。

文化動員在難民方面的應該大聲號召，一、難民問題不是一時的消極救濟可以解決的，政府當局當盡可能地把他們吸收到國防生產部門，使他們不致流為社會的遊民，也可以增強抗戰到底的力量。二、許多從這個問題而發現的社會問題，也當有黨政機關協同人民團體加以解決。

文化人應該擔負起教育難民的责任，雖然在很短的二三月中間，也可以相當地改變了他們的生活習慣，（如衛生，行動敏捷，）增加他們的集團意識及對於抗戰的理解。因為他們早遲都要分別回到內地去，若干年的都市生活經驗，尤其是這次的上海抗戰，因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使他們有的放棄賴以爲生的土地，有的弄得無工可做，斷絕生活的來源。果能加以迅速而正確的訓練，無論如何，他們將是內地民衆中的比較認識清楚的進步份子，自發的民衆運動，較之文化人的倡導，定能收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次是傷兵問題，我們覺得也不是救護了事的。他們出生入死，負了重傷，文化人應該組織慰勞隊，和宣傳訓練組織的方法，盡力去安慰他們，替他們寫家信報告前方抗戰的情形，並加以解釋。使他們不僅具備保衛祖國的熱誠，並且明白了正確的理論認識。

軍事動員是全面抗戰中的首當其衝的一環，而我們的士兵大眾呢，個個都是赤膽忠心捨身報國的健兒，一旦重傷痊愈，在他們，不啻「再生」在國家，又多了一個再接再厲的戰士，我們不但希望他們的創傷復元，更要把鬥爭的火苗，射到他們每一滴血液里

去。

(六)反間諜組織 我們對日抗戰，除了正規的軍事動作以外，反間諜的嚴密組織是不可少的，因為無論是從敵人方面祕密派遣的偵探，或是我們國內甘為敵用的漢奸，都大有可能破壞我們的戰略，甚至使我們敗北的。

我們看了許多法西斯蒂國家對於蘇聯革命份子所佈的間諜網，方法是怎樣的嚴密，手段是怎樣的陰險，誠令人不寒而慄。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我們的猙獰面孔是有過之無不及的，它能夠深入我們的各階層里去活動，「九一八」以來，我們的大大小小的漢奸，其數量之多，活動的深入，聞之咋舌。封建軍閥可以給利用為建立某一傀儡政權的柱樑，這一次蘆溝橋事變後的張自忠就是一個最好的代表。落伍的政客可以供給敵人祕密的情報，如二月前在南京槍決的黃璿父子。更足詫異的，一個是蜚聲文壇的詩人，一個是受過高等教育，且出國留學的優秀的青年外交官。至外壘斷居奇的資敵奸商，更是隨處可觸，因為他們的壘斷居奇，弄得平民小百姓生活愈陷於絕境，如供給敵人的糧食，

燃料及軍需品，無異助長敵人的力量，間接增加我們抗戰的困難。至於多得如毛的漢奸小醜，誠如疫癘的傳染，某軍長官曾慨然的說：

「殺不完，殺也不是好辦法，殘廢老弱，祇要證據確實，就處決了。這些人，對於國家民族不會再有好處，可是十四五歲的孩子……我只能將他們關了起來……」對於這班人實在不是斷然處死或是憐憫憐憫可以完事的。

反間牒的工作當然一部份應當由軍事當局去負責，同時，文化人對此也屬義不容辭。最大的原因，文化人是普遍於各階層的，中上層不必說，下層的也可在民衆組織中間接發揮他們的力量，至少是可以立在倡導的地位。尤其有一個特點，他們是分散在廣大的職業羣里，各以其本身及其接近的職業圈爲工作範圍，收效比較容易。

文化人在反間牒的組織中最適配做思想偵探，他們可以嚴密注意他們周圍及其可能接近的人們底平時的一言一舉，遇有可疑份子，不妨佯然稱友，加深關係，探明這人的究竟。

我們還想貢獻一點意見，反間牒工作應該注意在組織方面，尤其是對於一般民衆的組織，過去及現在漢奸小醜所以如此之多，最大的原因是民衆如一盤散沙，若是有了嚴密的組織，正面的工作可以加緊，同時再有團體的力量，時刻在監督和制裁當中，當然漢奸會逐漸絕滅的，說到這裏，我們又不得不大聲疾呼，普遍的啓蒙性的民衆運動，該是急起直追的時候了。

（七）國際友人的同情 許多的人常有一個錯誤的觀念，他們以爲在今日，除了蘇聯及若干弱小民族以外，再沒有同情我們的了，當然，這是我們多少年來領受了美國的實利主義外交及英國的狐狸紳士外交的反感。其實呢，全世界的和平大眾都是我們的同情者。更澈底的講一句，就是在敵人的國內也有無數同情我們的友人，問題的關鍵，還在我們自身的如何努力。

「八一三」上海抗戰，因爲我們展開了全面的鬥爭，前方的忠勇將士更是奮不顧身，前仆後繼，這種精神真是動天地泣鬼神的，所以無論羅斯福總統的演講，志在調解中

日糾紛，讓中國吃一個暗虧，無論英國的意向把中日糾紛移交九國公約會議去處理，來延長我們的痛苦，甚至在閣議中聲明對日經濟制裁不適時宜。但是英美兩國的人民大眾還是如火如荼的熱烈援助我們，甚至在敵人的國內，我們也常常聽到反戰的呼聲，暴露了他們內在的弱點及矛盾。

國際友人的同情是不應該辜負的，這不但要求我們的賢明政府速即決定國策，及軍事負責者的努力不懈，我們文化人也應該盡忠實報道的責任，使他們能夠獲得正確可靠的事實表現，才不致於滅殺他們對於我們援助的熱忱。

思想進步通曉國際情勢的文化人，應該從速展開一個強有力的國民外交陣線，以一種散兵線的奇技，輔助正常外交折衝的不足。我們覺得應該努力的至少有下面幾點：

(一) 請求政府慎重選派國民外交使節赴世界各國宣傳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野心陰謀，及其摧殘世界文明的種種事實。同時，以最大的理智力和感情，說明中國抗戰不是謀自身的自由解放，也是替世界的公理正義求伸張。

(二) 用種種方法保持並擴大世界各國已經成立的類似「中國人民之友」的民間組織，使其充分發揮效能。

(三) 凡是我們國家或人民已經加入的外交團體，學術團體，社會公益團體，現在都應該用國家或個人的名義，一方面作宣傳揭露的工作，一方面請求實力的援助。以增加世界各國對於我們的同情，使敵人受世界輿論的制裁，陷於絕境。

最近我們已看到少數高等知識份子分赴歐美擔任這種國民使節的責任了，但是顯然的，陣線不夠堅強，數量與人選都不能令人滿意。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成立了一個國際宣傳委員會，曾請了幾位外交界知名之士向美國人民廣播演說，當然不無微效。我們要知道，在敵人國內尋覓到一個同情的友人，比消滅了一個敵人有效得多。何況，我們是名正言順，日本的進步分子如果接受了我們的呼籲，甚至自發地起來，我們相信有這樣一個廣大的社會根據，是不難激起一個運動的波瀾的。

同時我們知道，假使全世界的和平大眾能夠真正地團結起來，不但可能摧毀了一

個日本帝國主義者，所有的侵略贖武的帝國主義者，都必步武日本的後塵。

我們不僅爲了這次的對日抗戰，也爲了全人類的將來，應該緊緊地抓住這個機會，發動一個大規模的反帝運動，我們就是這次運動中的一員先鋒！

文化動員的工具

在決定了文化動員的諸對象以後，就得充分考慮它的工具的運用問題。許多文化人很爲這個技術問題煩惱與焦急，因爲他們往往感到無法與羣衆接觸，一旦勉強的接觸了，事工的效果固談不到，而他們與羣衆的關係已經惡化起來了。

這就證明理論與實踐是一件事情的二面，決定對象，那是通過了文化人的認識作用才完成的，而工具的運用却是最實際的行動，兩者不能缺其一，且須作有機的連繫。

文化動員的工具是：

(一)文字宣傳 文化人常常講「操禿筆以前驅」可見筆桿是他們底鬥爭武器。關於文字宣傳工作，我們覺得今日的文化人不要僅以在通都大邑的書報雜誌上寫文章爲滿足，同時要深入內地，爲窮鄉僻壤的人民大衆作忠實的報道，及行動的指導，

最主要的是壁報。

壁報的任務是以教育並提高大眾對於政治的理解，及文化的興趣，並更積極動員大眾參加神聖的抗敵戰爭爲主要使命。

關於壁報的內容，是可以有它極大流動性的，但是至少有以下幾個項目。

(甲) 抗戰消息 後方的廣大民衆最爲關心前方的抗戰消息，這是一個頗好的現象，但是這里潛伏着一個危機，若是他們僅爲抗戰消息的勝利或失敗來轉移他們感情上的喜或愁，萬一我們在軍事上遭到重大的挫折，他們會對抗戰的信念發生懷疑和動搖的。文化人除了作抗戰消息，忠實報道以外，更應該用種種淺顯的說明，這次我們對日抗戰是長期的全面抗戰，中途妥協無異自取滅亡。因爲是長期抗戰，我們要盡力地持久，消耗敵人的戰鬥力，攫取最後的勝利。因爲是全面抗戰，占中國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工羣衆，無論如何也得踴躍加入這死活的戰鬥，保衛我們祖先傳下的江山和主權。

(乙) 國際動態 廣大的民衆爲了過去缺乏政治訓練，及文化水準的低落，對國

內的大事固屬不瞭解對於國際的情勢及友敵之分，更是莫明其妙，文化人至少應該使他們完全了解國際間的兩個對立陣線——侵略者與被侵略者的陣線，蘇聯及全世界和平大眾都是我們的朋友，甚至在敵人國內的被壓迫者。

(丙)短評 那是短小精悍的短評，對當前一般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分析，謠言或錯誤的糾正。中國的人民大眾也實在太可憐了，我們要動員他們，怎麼樣也該先給他們的模糊的意識一個廓清運動。庶可不致消極地影響後方秩序，並積極地負起抗戰前哨的任務。

(丁)戰時常識 不外防空，防毒……等類，在我們，因為飛機及高射砲的缺少，除幾個較大的城市有相當良好的防空設備外，其餘的實在有防不勝防的苦處。在這個條件之下，文化人中的技術人員。不但應該使民衆具備了這類戰時常識，更須在空襲下盡量避免可能的危險，那是需要嚴格的訓練的。

(戊)其他如壯丁訓練，救國公債，防止漢奸等，都有隨時加以宣傳及推行的必要。

(二) 演講 文化人除了以「筆桿」爲鬥爭的武器外，「口」也是同樣重要的。關於口頭演講首先要注意的是對象。如農民，小市民，工人，士兵，壯丁，學生……等。因爲對象的不同，演講的內容也要隨着改變。根據這些深入內地組織巡迴演講團工作者的經驗，他們異口同聲地訴苦，（嚴格的說起來是自我批判，）因爲他們常常滿腔熱誠地向羣衆演講抗戰的意義及民衆動員的必要，聽衆們大都瞠目相視，不甚瞭然，有的全悄悄地走開了，這使演講員感到莫大的失望和慚愧。

但是這個難關終於在工作的艱苦過程中克服了，記得力羣先生在救亡日報上發表了一篇短文，曾提到這個問題，他根據了自己的工作經驗說：「向農民們作口頭的宣傳，決不能像對學生演說，專注在理論方面，因爲那個與他們的生活隔離得太遠了，這當中有一段「脫節」；我們應該先從他們的生活做出發點，好比某地方有什麼特種生產，現在因爲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行動，破壞了我們的交通組織，這些生產品眼看運不到別的地方出售，白白地潰爛了。這樣一來，農民們感到切膚之痛了，他們會自動地追問

日本帝國的侵略行爲，不自禁地磨拳擦掌起來了。」

最近第八路軍的政治人員也公開向記者發表談話，詳述他們怎樣利用日軍在×××等處的屠殺民衆的暴行，向農民大事宣傳，農民們感到極大的恐慌，但他們向農民們說恐慌是沒有用的，只有從死里求生的一條路，結果，平型關一役完全收效於軍民的合作。可見演講又是一個很大的技術問題。

還有，口頭宣傳工作還有賴於別種工具的輔助，如傳單，唱歌及圖畫等，先引起羣衆的興趣再開始演講。

(三) 戲劇 戲劇是一種最有力的教育工具，它的對象最廣大，它的方式最生動，它的影響是直接的，在戰時教育總動員中，戲劇負着極重大的使命。

在去年綏遠挺戰的嚴重關頭，陳波兒女士曾率領十多位團員冒大風雪到塞北及平津各地演劇，增長了千萬士兵及民衆的抗敵情緒，他們大半在流着淚看戲，因為他們已經和演員溶化在一起，成了戲中人了！

這一次「八一三」上海抗戰發生，全國都在總動員中了，上海方面若干積蓄多年鬥爭經驗的戲劇工作者，組織成十多個救亡演劇隊分赴內地各處去進行戰時的民衆教育工作，從他們的報告或通訊中，可以看出許多樂觀的地方，一方面因爲全面抗戰已經成了全國人民大衆的一致呼聲，一方面也是爲了他們的嫺熟的高級的表演技術，使聽衆都能夠接受戲劇的啓示。

然而，在這次的實際工作中還發現了許多亟待補救的缺點：

(甲) 戲劇運動在某一個地方轟動起來，但是這個空氣不能持久，當上海戲劇工作者前往別處的時候，轟動一時的空氣又消沉了，我們覺得戲劇工作者應該一方面向羣衆演戲，一方面組織他們，成爲士兵演劇隊，農民演劇隊，兒童演劇隊，學生演劇隊，使一種戲劇的種子能夠收穫開花結實的效果。

(乙) 過去的劇本大多不能適用，戲劇工作者，應該針對着目前的特殊需要，編演灌輸戰時常識，報導抗戰消息，激勵抗戰情緒，指示抗戰途徑的通俗短劇。並且要盡量染

上本地風光，採用民間曲調。最近的趙景深先生大鼓創作，就很可在北方民衆前面試試，這許多都是需要戲劇工作者隨時隨地改變自己的方式的。

(四)音樂 自從「九一八」以來，在這六年當中，我們的音樂界已經脫離了沁人心醉的靡靡之音，而代以雄壯的新歌了。最大的收穫似乎還在國產電影中的插曲，如漁光曲，畢業歌，義勇軍進行曲等，差不多傳遍了家家戶戶。這實在是一個可喜的現象。

新歌曲的產生，當然有它底現實環境的根據——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殘酷壓迫，使我們的音樂家，本着他們的良知和正義感，在大衆的鬥爭中採掘許多可歌可泣的題材。新歌曲的呼聲應該普遍到全體民衆當中去。劉良模先生曾在去冬綏遠挺戰中教塞北傅作義將軍部下士兵每日高歌，根據他的通訊報告，士兵們每學會一隻新歌曲，喜之若狂，作戰時更增加並強調他們的抗戰情緒。因爲這些都是他們含蓄在心底的聲音，現在可以引吭高歌，這個一致的迫切要求，無疑的將見諸行動了。

還有，在去年魯迅先生的送葬禮中，千萬的羣衆排成一串長的行列，浩浩蕩蕩的，他

們當中有男女學生，工人羣衆，小市民及軍警，一致的堅決的呼聲，從千萬人的口中喊出，是多麼的雄壯，有力和感動。

我親眼看見在一處難民收容所里，當歌詠隊隊員領導難民們高唱打回老家去的時候，許多難民熱淚滿眶，終於悲憤失聲地大哭起來了。

今年魯迅先生的週年祭，我們又看見千萬的男女學生工人羣衆，小市民及軍警在莊嚴悲壯的氛圍中唱紀念歌，到臨散會時候，雄偉的歌聲又排山倒海地在空中震響了。

中華民族在過去是太老大了，太暮氣了，但是希望隨着這些救亡的歌聲，使我們的民族年青，有朝氣。

(四) 美術 主要的是指的漫畫和宣傳畫。

漫畫是教育民衆的良好工具，因為中國的一般民衆，過去文化水準太低，不識字的文盲佔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所以要向他們宣傳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暴行及抗敵的意義，單靠口頭的演說是不夠的。有的時候非用鮮明色彩，粗條線的大幅漫畫吸引他

們的注意和興趣不可假使能夠畫得具體點真實點更可以激起羣衆們的原始情緒

許幸之先生曾撰文稱讚漫畫是此次抗敵救亡中最強的一環，因爲在漫畫家生龍活虎的畫筆下，可以暴露日軍的醜行，我軍的英勇。也可以刻劃出漢奸的臉譜，及人民大衆的抗敵精神。

畫家不要僅以爲自己的作品傳流在知識羣中爲滿足，最重要的還是廣大的民衆，應該把它們傳流到難民收容所里，傷民醫院，和內地的窮鄉僻壤，使不識字的人也可以接受一個無聲的啓示，它的影響將越過任何文字，口頭的宣傳。

許多過去專以纖巧的形式自滿的漫畫家，現在雖然隨着全面抗戰的，展開大澈大悟了，但是「從軍」不得，率性連自己唯一的鬪爭武器——畫筆——也投掉，那是應該急起糾正的，須知一個能夠善用自己的畫筆，以堅強的色彩，剛健的筆觸，雄偉的構圖，壯烈的題材，神聖的魔力，暴露敵人的侵略野心，激發民衆的抗爭情緒的，已經算是立在自己的崗位，盡了救亡的任務了。

教育了別人也教育了自己

文化人雖然在意識上傾向社會大眾的福利，但是他們本身階級的劣根性，在某一時期，是大有「死灰復燃」的可能。現在文化人是加入了全面的抗戰鬪爭了，他們要做羣衆的率領者，這個場合之下，他們要在羣衆當中樹起信仰的基礎，否則，就必受無情的淘汰，正如在勇猛向前的浪頭中，他們成了退潮的支流了。

文化人私生活的調整

文化人若欲在羣衆當中起領導作用，必須隨時隨地克服並調整自己的私生活，使它嚴肅化起來。

有人曲解私生活的調整問題，他們以爲公私是截然二件事，一個人只要忠於事工，忠於團體，他的私生活縱有什麼不名譽不滿人意的地方，大可不必過問，其實，這是一個

頗爲錯誤的見解。

一個說謊的，貪污的，自私的，獨尊的人，姑不論他是用來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若是這些卑劣的行爲在他成了一個習慣的時候，他已經變爲一個可恥的靈魂，我們怎麼樣也不相信他能夠在公共的事務上是一個誠實，廉潔，大公和謙虛的人。

文化人除私生活的調整不外，是痛除有礙身心健康，防害爲公服務的不良嗜好。飲酒，吸煙，賭博，嫖妓……等，都在嚴禁之列。較遠的事實不必提，就以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文學家而論，沾染了以上的嗜好之一二的，不是在文學創作上充滿了悲觀玩世的頹廢氛圍，就是爲羣衆所拋棄，團體所不齒：記得當中國左翼作家受過極度壓迫的時候，就有一位作家恬不知恥地公開聲明：「文學家不是戰士，就算我臨陣逃脫罷。」

本身階級劣根性的克服

這種種危機的作祟，也是使我們的文化人自暴自棄，復暴棄於人。文化人當中有若干是「夜郎自大，唯我獨尊」的，這類人，大都沒有受過嚴格的集團訓練，更不信大衆力

量的存在，他們只知道「小我」，不願「大我」，這樣就很容易成爲一個個人英雄主義者。這類人參加了一個團體，往往一意孤行，在相當順利的環境中，他們是一個獨攬大權的人，萬一到了事態陷入逆境，他們會爲了自身利益的保持，對團體作最後一次的利用，他們就把團體出賣了。其次，就是文化人只會「紙上談兵」，一切未能見諸行動。他們自己一方面因守着「閉門造車」的老脾氣，一方面卑視商人，農人，工人和當兵的，十足地表現了士大夫的臉相。所以有人諷刺文化人說他們吃了數十年的米糧，偶然下鄉連田畝中的五穀都分不清楚，這實在是最好的譬喻。最大的缺點，就是文化人大都沒有實用的技能，除了會運用一枝秃筆以外，什麼也不成了。而文化人若要動員到羣衆中間去是需要相當程度的行動化和技術化的。試看下面一張服務登記表，有幾個文化人能運用呢。其表於下：（一）消防，（二）交通，（三）工程，（四）建築，（五）醫學，（六）電氣，（七）運輸，（八）機械，（九）駕駛，（十）繪測，（十一）間諜，（十二）警犬，（十三）信鴿，（十四）看護，（十五）攝影，（十六）游泳，（十七）劇戲，（十八）外國語，（

十九) 無線電收發技能, (二十) 國術, (二十一) 重要方言。

從羣衆方面學習

文化人私生活的腐爛, 及其本身階級的劣根性, 都是使他們見棄於羣衆的最大原因。要使他們的私生活嚴肅起來, 要使他們的劣根性加以克服, 惟有從羣衆方面去學習, 漸漸地變成羣衆中的一員。

使文化人可能與羣衆接近的, 是文化人隨着他們生活環境的極大變化, 他們在經濟基礎上沒落了, 這將必然地反映到他們底意識上的進步。我們更相信文化人一定感於自身責任的重要, 及羣衆力量的偉大, 在教育羣衆當中更會虛心向他們學習的。

我們的廣大羣衆在貧窮, 愚昧, 衰弱之中儘有許多可歌可泣的事實, 值得人們肅然生敬, 這些事實且不必從過去的史蹟中去尋覓, 六年來, 在「滿洲國」, 「王道樂土」上的東北人民義勇軍, 塞外苦鬥, 誓死不屈, 記得三年前黃任之先生在青年會公開演講「華北的危機」, 最後他拿一段發生不久的事件勉勵我們不要失望, 他說到吉林省伊蘭

村的人民義勇軍聲勢非常浩大，常常以遊擊戰術使日軍疲於奔走，應付困難。日軍於惱羞成怒之餘，揚言非殺盡伊蘭村民而後快。伊蘭人民義勇軍及全體村民得此消息並不慌張，後來經過全部壯丁的最後決定，召集全村男女老小，報告日軍即將來犯的警耗，個個義憤填膺，爭先殺敵，沒有多天，日軍果然大隊來犯，而伊蘭村人的全體壯丁已經個個手刃妻孥，嚴陣以待，最後將日軍擊退，再未來犯。這不是一樁驚天地泣鬼神的事蹟嗎？

最近「八一三」上海抗戰以來，我們有姚子青全營士兵死守寶山與城同殉的偉大事蹟，十月二十六日北我軍作戰略上的撤退，居然有謝晉元全團八百人，盤據四行倉庫，高懸國旗，誓死不退，他們聲言願隨着最後一粒彈流最後一滴血，並紛紛致書家屬，堅示訣別；於是上海的中外居民紛紛前往慰勞，女童子軍楊惠敏女士冒險獻旗，更有千萬民衆隨帶乾糧飲料深夜前去，展轉投送。最足感人的是若干收容所的難民也爲這八百壯士絕食，節款慰勞。所以這件動人心魄的事件，立刻爲全世界人民所矚目，各國報紙除根據軍事觀點外，就以中國士兵大衆的忠勇不屈的犧牲精神而論，也公認這次是我

們的「勝利的退却」了。

當一個文化人投身在大時代的漩渦里，他親眼所睹了這些偉大的事蹟，能無動於中嗎？我們相信，廣大羣衆捨身報國甯爲玉碎的精神，不但會燃起他們底洋溢的熱情和正義，而且會使他們感於民族解放的死活鬥爭而嚴肅起來，覺得有愧於羣衆，盼望成爲他們當中的一個，來完成偉大的神聖任務。

現在再舉一個例子，那是根據一個西洋文學家的作品：

一位身穿燕尾晚服的紳士，在燈紅酒綠之後，出外觀賞晚景，忽然有一處大火，於是房屋的坍塌聲，婦孺的呼救聲，路人交相嘈雜，洋龍的風馳電掣，一時秩序譁然，而我們的紳士被捲入了羣衆的浪潮中，拔身不出了。起初他對羣衆很憎厭，心中的反感不斷的湧現，幾致忍無可忍，原來是他的燕尾服給沾污了，加之，他又聽不慣那種煩亂的雜音。但是羣衆是愈湧愈擁了，他一個無用的人雜在當中，很使別人感到不便，不免報之以不耐煩的呼喝，而我們的紳士又無法掙脫這個漩渦，於是只好聊自解嘲地率性以觀賞火景者

自居了。火勢愈爲擴大，救火的人羣個個爭先搶險，那樣奮勇犧牲的精神流露在他們的面上，臉上更是泥水和汗的交流，這時候，我們的紳士真的給感動了，一種原始的同情心激動了他，他也就脫下了那身污泥不堪的燕尾服，跟了羣衆去汲水灌救，直到大火熄滅了爲止。

這一段描寫簡直是我們文化人參加羣衆生活的活相，有許多文化人，最初與羣衆接觸時，起了很多的反感，他們討厭農人的土氣，商人的混俗，工人的耿直，兵士的粗野，覺得一與他們接觸，就會沾污自己的身份。後來感到羣衆一方面鄙視他，一方面在他們面前表現了強大的身手，這會使一部份被感動的文化人立於靜觀的地位，但是羣衆之感，人力量畢竟是偉大的，終久必把進步的文化人吸引到他們的陣營里，成爲他們當中的一員，並且在思想的路線上做他們的領導者。

理論與實踐的統一

談起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使我回憶二年前看到一節短劇的公演：一個工人推着一

輛重載貨物的卡車，不能推過一處高崗，不得已向路人求助，於是路人中的學生、摩登女子及警察等都被請求，未能實際相助，後來又出現了一位彬彬有禮的學者，他對於這個工人的要求，完全從理論的推測上回答他，說了一大篇根據物理及心理學的大道理，結果是相視而去了。

一個文化人在參加羣羣衆運的前後，常常會犯這種毛病，他們不能把理論與實踐統一起來。要知理論不進於實踐，這個理論還是原封未動；世間沒有一樣永久靜止的東西，一種理論常久不運用，就會因本身的缺陷太多，歸於淘汰的一途，而且理論也只有有實踐中才能充實它的內容，正確它的方向，增強它的力量。

試舉二個例子：（一）在俄國大革命後，列甯提倡新經濟政策，當時就有一般人批評他是一個不澈底的革命者，甚至誣他變了節。其實列甯提倡新經濟政策，給少數富農稍許迴旋的餘地，正是當時客觀環境的必然，不但與馬克思主義不相違背，且更傳襲了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建立了更澈底的列甯主義。假使歷史家要評定功罪的話，那麼奠

定蘇聯國防五年計劃的基礎的列寧是一個大大的功者。(二)在列寧逝世後史太林與托洛斯基之間又起了一種政策上的爭執，史太林主張先把社會主義在蘇聯一國內實驗起來，然後再隨着客觀環境的好轉，發動世界革命，最大的理由是蘇聯在國防上太脆弱。而托洛斯基則堅決即刻發動世界革命。現在托洛斯基成了一個亡命者了，蘇聯在史太林領導的二次五年計劃之下，已經漸漸的壯大起來，成了世界和平的重鎮了。但是史太林並沒有放棄世界革命的最後任務，近年來資本主義各國的反帝反法西斯蒂運動，雖困於各國統治階級的壓迫，受蘇聯的影響及援助，也是不可抹殺的鐵般事實。尤其在火山口的歐洲大陸，蘇聯與若干國家訂立互不侵犯及互助公約，這給法西斯蒂陣線一個嚴重的威脅。自從加入國聯後更領導弱小民族向帝國主義者反抗。最近，蘇聯給與西班牙及中國人民的援力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從以上二個歷史證例中，我們可以知道，任何理論不是一成不變的，我們要把它放在不斷的實踐底過程中，隨着客觀環境的變化而移轉，使理論進入了更高的階段。

同時文化人也不應該僅以獲得一個問題的理論上的解釋爲滿足，而且，有的時候，連這個的理論的根據都不正確，那就更應該接受事實的指示，與自己的理論對照起來，看能不能起配合作用，及統一性的建立。

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版

文化人的崗位

實價國幣一角三分

著作人 王 健

發行人 大時代出版社

總經售 大公報代辦部

廣州漢民北路

特約經售 新民圖書雜誌公司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大時能

